

历史人物

魏建功与刘半农

□徐继康

敬斋藏有一副刘半农写给魏建功的五言对联：“有心种梅花，随笔录旧诗。”这是两位大师之间纯真友谊的见证。



1932年刘半农(前排左二)、魏建功(中排右四)与章太炎(前排左三)等人在北大二院合影。

魏建功是从南通走出去的一代语言文字大师，他一生治学严谨，成就斐然，尤以主持编纂《新华字典》而被人称为“新华字典之父”，其成就取得与诸位老师的帮助是分不开的。1919年夏，他第二次考进北京大学，录取在文科乙部英文班。那时北京大学大师云集，魏建功几乎直接听过胡适、鲁迅、陈独秀、周作人、钱玄同等人的讲座，却唯独没有上过同为新文化运动先驱之一刘半农的课，因为当时刘半农正在英法等国留学。

魏建功却对这位素未谋面的刘半农先生了如指掌，知道他自幼聪慧过人，才华横溢，凡涉足的小说、诗歌、古代文学、戏曲乐律、语言、教育等领域皆取得杰出成就。刘半农的身上不少中国第一，他第一个创造使用“她”字来专指第三人称女性，第一个把高尔基作品介绍到中国，是最早将狄更斯、托尔斯泰、安徒生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译者，是中国民歌收集与创作的领路人，还是中国最早的摄影艺术家之一，他撰写的《半农谈影》是国内第一本系统地阐述摄影创作艺术理论的著作。1925年，他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得以外国国家名义授予的最高学位的中国人。此外，他创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曾经风靡全国。

1925年，魏建功以各科学名列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被老师沈兼士誉为“乙丑科状元”，而此时刘半农也恰好取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后重回北京大学任教，魏建功深知刘先生在语言学上的造诣，掌握有西方世界最新的语音学研究方法与方向，便急于向他求教，在沈兼士介绍下，两人很快熟悉，魏建功遂师从刘半农学习西方科学先进的语言专业知识。

魏建功毕业后，北京大学决定将他留校任教，但必须经过校聘委员会同意才能通过。就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刘半农推荐他去兼任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的国文系讲师，以便解决魏建功上一年宣告“经济独立”而带来的生存问题。刘半农回国后任北大国文系教授，兼任北大研究所国文导师，建立了语音学实验室，成为中国实验语音学的奠基人。1926年春，魏建功被北京大学正式聘任为国文系助教，协助刘半农做“语音学实验室”工作，就这样魏建功成了刘半农最重要的助手。此后，他俩在工作与生活中朝夕相处，结下了亦师亦友的深厚友谊。在刘半农的指导下，魏建功在语音学研究上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特别在“方言同音字”计划中做了不少珍贵的记录与调查，他还曾经把家乡的南通话、如皋话作为研究对象专门写了论文。

1928年春，魏建功从朝鲜京城帝国大学回国，与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王尚济的次女王碧书结婚，婚礼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举行。在婚礼上，发生一段可以写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花絮，刘半农提议推荐鲁迅先生作为世界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界的提名候选人，并让台静农给鲁迅写信，准备候选人著作翻译稿以及相关资料，后来被鲁迅拒绝了。1956年，魏建功还在《文艺报》上刊文回忆这段往事。

1934年6月19日，刘半农带队沿平绥线去内蒙古一带进行方言调查，魏建功还去西直门车站为之送行，谁知此别竟成了永别。7月14日，刘半农在调查途中传染上了回归热，回京医治四天后不幸去世，年仅44岁。刘半农的骤然辞世让魏建功悲伤欲绝，7月18日就撰写了《十年来半农先生的学术生活》，开篇

哀痛便迎面扑来：“来往二十二天的旅行就成了人生绝大悲伤的诀别，我还跟做梦似的不相信半农先生竟死了！”在文中，他深情回忆了自追随刘半农研讨中国语言语音学来的诸多情况，对病榻前未能再见一面感到万分悲痛。他挥毫写下“无奈虱鼠怀毒螫，剧怜桃李正春风”的挽联。他参与料理刘半农的身后事，对整理刘先生的文稿与藏书不遗余力。1935年4月7日，魏建功在西山香山传舍又写了《中华民国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刘先生行状》长文，介绍刘半农的家世及其生平事迹，这是迄今为止对刘半农论述最为详尽也最为公允的文字。此年的5月29日，刘半农被安葬于北京西郊香山玉皇顶南岗，周作人撰写墓志铭，魏建功书写上石，马衡篆盖。周作人在墓志铭文末写道：“夫人及友人命绍兴周作人撰墓志，如皋魏建功书石，鄞县马衡篆盖，于谊不能辞，故仅志而书之。”

的确，在互敬互爱中结下的深厚友谊怎么可能会被忘却呢？1935年年底，魏建功的《古音系研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魏建功音韵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是他读书、研究、思考多年的学术结晶。在“自序”与“后序”中，他都提到了刘半农先生。特别在“后序”中，他饱含深情地写道：

这一部千头万绪的试探摸索的启蒙书，在其产生时间居然失去几位足资教益的师友，没有得他们同观厥成！刘半农先生他是如何地希望我，我忘不了的；他常对我说，关于音韵的问题属于本书范围的让我研究；并且今年春天这样说道：“我们得努力表现一点成绩给人看！”此书正由他促成出版了，连校样都没有给他看见，谁料到他就突然地故去了呢？

这部是魏建功自称为“增加了许多精

神上的伤痛”的书，他始终记得刘半农先生对他的帮助与鼓励。

1936年，一本叫《十韵汇编》的书出版了，此书原由刘半农主编，刘半农去世后，由罗常培主编，魏建功担任编辑并写了序，其实这是他帮助刘先生要完成的遗愿之一。此后，魏建功在编纂辞书、国语运动、音韵研究、汉字改革，歌谣收集整理上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些都是刘半农以及诸位先生一生未竟的事业，魏建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拓展新路，将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几代人的理想最终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在那本《新华字典》上得以完美实现。

魏建功对刘半农始终没有忘怀，他还撰有《我对于刘半农先生的回忆》等文章，在他的《魏建功印谱》中，留下了为刘半农所刻的印蜕。当然，刘氏后人也没有忘记这位魏先生，2001年8月，在“纪念魏建功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魏建功文集》出版学术研讨会”上，刘半农长子刘育伦撰写了《缅怀魏建功先生》来纪念这位父亲门下最得意的弟子。

敬斋藏有一副刘半农写给魏建功的五言对联：“有心种梅花，随笔录旧诗。”上款为“建功仁弟属正”，落款是“半农刘复于含晖堂”，下铃“刘复”白文印。字为行草，涉笔成趣，原装原裱，古色古香。这是多年前在一个拍卖会上看到的，心里想无论如何也要拿下，后来经过多轮竞价，真的被我买下了。

刘半农平常有记日记的习惯，可惜历年来的日记毁于“文革”期间，仅存了一本1934年1月至6月的日记残册，其中多次记载他与魏建功的交谈，最后一次是6月12日：“到研究所，建功来谈。”对联上没有日期，不知写于何年，但这有什么打紧的呢？这副小小的文房对，正是两位大师之间纯真友谊的见证。

史海回眸

陈园西瓜

□赵鹏

芦泾港陈葆初的私人园林，民间习称为“陈氏花园”，园内以广植名木古树和有着大片桃林而著名。当年每逢桃花盛开，那儿往往成为城内小学生的春游“远足”之点，而张謇晚年也曾邀友前往观赏，并留有诗作。陈园的这些风物，久已为人们熟知，然而园内还曾出产过良种西瓜，却几乎未见人提及，因此可以一谈。

1936年7月26日的《新江北日报》，刊有《陈园西瓜京沪闻名》一文，介绍其处出产的西瓜。文章被加以花边，似有广告之意，现录于下：芦泾港陈氏花园，为南通最大园圃，所植花木果类，尤多名产。暑令应时果品，如西瓜、蜜桃等，今年收获尤丰。西瓜且多欧美良种，培植得宜，甜美可口，通人享客饕友，视为上品。连日以天气奇热，销路特畅，京沪等地亦有托轮购带者，其盛名可知矣。用该园不欲自秘，拟将良种送农教馆分赠农民，导以植法，以求推广，为南通增一名土产云。

文章没有讲西瓜的具体品种，我却联想起《徐乃昌日记》里的一个记载，那是1933年6月17日(旧历五月二十五日)所记：“费范九赠南通马铃瓜四枚。”按南通农家过去虽然也种西瓜，却未闻有什么特别的名种，费范九特地从南通带瓜赠给寓居上海的徐乃昌，首先这瓜要比较名贵，想来想去，它一定是陈园的出产了。费范九与陈葆初本就熟识。

马铃瓜这个名字，以往常能听到，那是西瓜的一个较好的品种，其主要特征似乎是长椭圆形，黄瓤红子，皮薄味甜。只是其种如今虽未绝迹，却已被更好的品种取代了。至于当年这个品种的珍贵，李伯元《南亭笔记》里有一则记述可见一斑，抄于此：

常熟产马铃瓜，绝甘美。翁(同龢)官军机大臣日，每瓜熟，其家属辄从海舶寄一二百枚至京，然腐朽已过半矣。相国除自食外，遍馈戚友，每人一只，人恒珍之，而不及同乡。京官某街之，后乃啖崇文门监者，悉数扣留。翁后知之，不欲以小事兴大狱，遂一笑而罢。

报纸称陈园的西瓜“多欧美良种”，估计有点夸大其词，比如马铃瓜就极有可能是从常熟引进的。陈氏花园现今已被改建为“城市绿谷”，似乎已无可供种瓜之地，否则辟一畦地复种此瓜，那就能鲜活地保存下一段掌故。

传家宝

私章

□杨汉祥

近日回苏中通东农村老家，在几间老屋里整理物件时，无意中在一张旧梳妆台的抽屉里发现了两颗木质印章，所配的胶木章盒呈灰黑色，看上去显得陈旧土气，盒内一侧印泥池内的红色印泥早已干涸，印章底面上刻的分别是我爷爷和奶奶的姓名，显然这是两位老人家生前使用过的印章，记得当时我老家一带的人们称之为“私章”。

说起私章，现在除了一些书画家使用的各类艺术印章外，极少有人再使用这种显示自己姓名的老物件了，许多年轻人甚至已经不懂其为何物。然而在三四十年前，私章在社会上较为普及，凡在社会上需要经常对外交往的成年人，一般都要请刻字社的艺人为自己刻上一颗私章。

当时个人私章很简陋，其章还采用的都是普通木材，如柳木、桦木、榿木等，讲究一点的人采用桃木、梨木、黄杨木乃至红木当章坯。当然也有极少数人用牛角、石头等材料刻私章。个人私章一般都呈长方体，上下底面呈正方形，其正方形的边长一般为1厘米多一点，其高为3厘米左右，这样正便于使用人用三个手指抓住章体后往纸上盖。私章的字刻在底部的章面上，其四周的正方形套边以及里面的姓名字体都凸出，在篆刻上称之为“阳刻”。为了让盖在纸上的名字清晰、好认，私章上的字体都为正楷或黑体。

因为过去没有现在那些机械刻字以及电脑刻字的设备，私章全由艺人手工刻写而成。刻章艺人先把选定的章坯底面磨平，然后在底面上用毛笔写上印章人的姓名，包括在四周套上边框，最后用刻刀把章面上没有字迹以及框线的部位挖去，留下的凸出部位则是章面上的内容，因为在章面上写的是反手字，这样盖在纸上的章印就是正手字，看上去既清晰又美观。另外，当时还有少数当领导的人专门刻有由个人书写的签名私章，主要盖在颁发给下属的一些获奖证书、毕业证书、任命证书之类文书上。这种签名私章没有边框，比普通私章略大一些。

为了妥善保存与方便携带，当年很多人刻了私章后都要配一个专门存放私章的盒子，章盒与私章的坯体一样呈长方体，比章坯略大一点，盒里除了有放私章的位置外，还留有一个存放印泥的隔舱，人们称之为印泥池。主人要盖章时先将章坯拿出，接着顺手把私章在印泥池里稍微压一下，章面上的框线、字体就会蘸上印泥，然后盖在纸上就会留下一个清晰的印文。

过去需要人们盖私章的地方不少，比如：从邮递员手中收取挂号信、包裹、汇款单、电报稿之类的重要邮件时，必须先向邮件发送单上盖上收件人的私章，然后才可以收取；又如农户从当时的生产队会计处领取现金等报酬时，也要先在有关表格上盖上户主的私章，甚至当年有些单位职工在领取工资时，也要在工资表上盖上私章；再则，人们在出具借据、收条等字据包括签订合同之类文书时，也需要当事人在自己的姓名上面加盖私章。另外，过去社会上识字以及不会写字的人比较多，所以凡要他们签名时，除了让他们按自己指纹印外，就是请他们用自己的私章替代。所以，当年不少居民习惯把自己的私章随身带上，以便随时使用。

后来，由于居民普遍有文化，自己随时都能手工签名，加上居民身份证的普及与电子签名的兴起，需要人们盖私章的地方越来越少，正因如此，现在社会上很少有人再备个人私章了，至于过去常见的手工刻字社以及刻字艺人也难得一见，如果现在有人还留有过去的私章，那一定是件稀罕物，有的人甚至还将其作为藏品予以收藏。

地名掌故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南通江畔，以狼山为界，上有天广任姚四港，下有小洋、裤子、营船、富民、花园、新开、长桥、老洪等八港，是船只进出长江或引水排水的主要通道。其中，位于军山段江岸下行约2公里处的营船港，是“沿江八港”中的一座重要港口。

营船港究竟始于何时？暂时未有考证。笔者所见最早为同治元年即1862年的一份资料：当年11月，因病仆李升去世，赵烈文(曾国藩幕僚)送其灵柩回乡。在福山镇总兵鞠列三(耀乾)所派二艇护送下，出吴淞口，过崇宝沙、长安沙，到海门余家港后溯江而上。据其日记记载，赵烈文抵达营船港后，令炮艇护航抵到靖，自己则登岸经狼山、通州城、如皋石庄往靖江。

作为一处地名，营船港以港口而得名。它是一处重要关隘。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曾上《续议江苏水师事宜折》，提出在内洋五营之狼营中，“以狼山港驻四船，营船港驻四船，老洪港驻四船”。史料显示，该港最晚在民国初期

就设有水警。而1917年则有报道：“驻营船港水警巡船，拿获劫掠棉花子船案内之盗匪陈某一名，现已押送该分署转解镇守使署，交军法处审讯。”1928年，又有报道：“驻防营船港之水上公安队秦巡长暨一兵士，因在(裤子港口)盗船盘查，致被匪党枪击致命。旋经军警闻讯奔至，与盗开枪激战，盗党即弃船逃走，在营船港夺得民船，开往江南而去。”

1913年，江苏国税厅在通设立货物税总公所。其中，在该港口设置营船港分公所，“收本县花布统税，并收本县起运第一机关之税及进港船只第二机关之税”。另据记载，货物税“捐项以花布为大宗，百货次之”。由上可见营船港口当年在军事、治安及税收等方面的地位。

它是一座沿江渔港。早年，附近渔民、鱼行船只在营船港上岸，而所收渔船捐则用于设在该港的通竟立初级小学常费之用。1924年，因“营船港口涨滩渐高，船只进出不甚便利，咸鲜鱼船多改由裤子港(即：按：裤子港)进出，行家因

此藉口船在裤子港，不肯缴纳学捐”。报载其中的沈启祥鱼行，在1924年春售出南北洋黄花鱼，仅报捐四成；后又运到冰鲜黄鱼两船仅收渔捐十干文；又有腊月运到“南洋带鱼一船，学捐亦未缴纳”。因其延宕不缴，经该校校长陈倬(字章云，兼任宁波旅通崇海同乡会会长)1925年2月函请转县后，才飭令小海警区协助征收。随后，县长卢鸿钧发出告示，明确“时鲜咸鲜各行在营船、裤子两港营业者”，须照“收捐章程悉数缴纳，不得借辞推诿”。

新中国成立后，营船港渔港功能依旧。1990年版《江苏海洋渔业史》就有“沿江南通县的营船港、张家港市的张家港、江阴市的黄田港等处，近几年海洋捕捞发展较快，尤其是外海捕捞船只数量不断增加，渔业都已有一定规模”等记录。同时，营船港渔业港区还与天生港、洋口港、东灶港等被列入江苏省50个群众渔港。

它是一个航运港口。长江主航道流经南通水运(河港)口岸，而营船港航道为南通沿江拥有的两条专用航道之一(另一为天生港航道)。《中国政区大典》载，1990年

营船港

□羌松延

代，营船港码头的内河承运量超过千万吨。故曾有“营船港海事所”设于此地。

“文革”期间，南通轮船公司开发长江航线，其中包括营船港至浒浦的对江航线。该航线主要为苏北地区长途贩运家畜的农民服务。他们从苏北平原地区用自行车装载家畜至营船港登船，客轮上备有停放自行车和禽畜笼架的设施。旅途中有人在船上休息，过江后可赶到上海上市销售。据《南通市交通史》记，这条航线开辟后，客流量日渐增多，最高的1973年比上年增长23.44%。改革开放后，南通轮船公司先后添置“新海”“新浏”“新龙”等长江双体客轮，除担负青洲线任务外，还增辟了营船港至浏河、南通至浏河客运航线。即营船港辟有浒浦、浏河两条航线，并有江轮通航。该港客运码头运营航线的开辟，为改革开放初期苏南苏北的人员与农副产品流通作出了历史贡献。

随着交通事业的迅猛发展，更多便捷过江通道陆续开通，营船港航线也早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但它造福人民的交通便利，久久留在了一代人的心中。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